

● 潘 石 著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

吉 林 大 学 出 版 社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

潘 石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

潘 石 著

责任编辑：张显吉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东中华路29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992年6月第1版

印张：12.5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309千字

印数：1—1000册

ISBN 7-5601-1179-3/F·274

定价：6.30元

自序

奉献于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我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撰写的论文汇集，也是我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经济学论文集。回眸望去，十余年的治学道路，风风雨雨，沟沟坎坎，洒下去的有汗水，也有心血；有苦恼，也有欢乐。不管怎样，我是连滚带爬，拨云排雾，追着阳光走过来了。清点文章，居然有百篇之多，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好在绝大多数文章经得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并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黯然失色，也没有因实践的发展而“过时”。尽管有的文章带有稚气，是“不成熟之果”，有的甚至具有某种偏颇，但我仍然十分欣慰、十分兴奋：因为它凝聚了我十余年苦心钻研的心血，是我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科学研究道路上奋力前进的真实纪录。此时此刻，我真正尝到了耕耘后丰收的喜悦！

我于1964年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攻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遗憾的是从1966年夏开始了那场令人痛心的“文化大革命”，中止了学业。1969年8月，我毕业留校，开始在校“革委会”办公室干行政，一干就是几年。这期间，我自修完了大学五年课程，并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主要著作。1976年，我转入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开始讲授政治经济学，科研的主攻方向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那时起，我一边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一边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没想到，1979年春，我居然被著名经济学家、我系系主任关梦觉教授选中，作为他的助手。这使我有机会直接受教于关老，使我在教学与科研中产生了重大的飞跃。关老治学严谨，一生坚持与弘扬马列，矢

志不渝。他不仅言传身教，而且帮我把握科研的方向。由于关老的热心提携，加之学校的大力培养和提拔，我于1987年10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1年1月又被破格晋升为教授。这期间我潜心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勤奋笔耕，先后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中国经济问题》、《教学与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文集，就是从这近百篇文章中选辑出来的。有些文章由于与本文集书名及内容不太吻合，故没选入；有些文章则由于篇幅和字数的限制，不得不割爱，拿掉。但也有些尚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考虑到内容的需要，尽管并不十分成熟，也编入集内。

我并不聪明，但我自信勤奋出智慧、出才能、出成果。我的座右铭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只要勤奋，无论多高的书山也能攀上去；只要不怕苦，就可以在学海中遨游。回想过去的十余年，我大半是在四口之家住十一二平方米的斗室中边教书边搞科研的，常常在孩子写完作业之后才能备课和从事论文的构思与写作，而这一般都在12点以后，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对此，我并没有怨言。因为当时国家有困难，学校的条件就是如此。艰苦的条件却磨炼了我的意志，迫使我拼搏，在书中寻求乐趣。有时为了“悟”出一个新观点，竟寝卧不安、茶饭不思；为了查找一份资料，竟翻箱倒柜，搞得家中大乱。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研究、勤于探索，苦自不觉苦，苦中有乐。我的这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可以说是勤奋的结晶。

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工作者的天职，也是我治学之本。自马克思主义问世之后，国际上一直存在一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面对这种挑战，

首先应当十分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设法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坚持，谈何发展？当然坚持是为了发展，不发展也难以坚持，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坚持。我力图把这个思想指导原则贯彻到教学与科研的实践中去，体现在每一节课与每一篇论文中。只要你通读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便会明显地体察到这一点，尽管我做得还很不够，存在一些缺欠。

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关在书斋里进行，而必须紧密联系和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离开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谈不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才能发展，才会有生命力。经济学家不应关起门来作学问，而应深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研究新问题、探求新规律。大学教授的科学研究，也要面向改革、开放，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实际有多种方式、多条途径。探讨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可以直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这是最好的联系实际。《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一书，在这方面作了最大的努力。我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繁荣与发展，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科学的道路，漫长而曲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尚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和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仅仅是我踏上科学道路的一个起点，今后我愿同经济学界同仁一道，做一个永不停顿的开拓者、探索者。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及读者批评指正。

潘 石

1991年12月12日于吉林大学

目 录

自 序

(一) 总 论

1. 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 (3)
2. 试论经济规律的质和量…………… (17)
3. 价值规律体系初探…………… (30)
4. 论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及其职能
作用…………… (42)
5.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加强量的研究…………… (59)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所有制问题

1. 对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若干理论问题的
思考…………… (65)
2. 生产资料所有制新探二题…………… (79)
3. 对“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对分离”说的反思及深化
改革之我见…………… (87)

(三)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

1. 论商品计划经济…………… (101)
2. 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探讨…………… (109)

3. 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新机制的若干理论考察……………（134）
4. 坚持和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49）

（四）私营经济研究

1. 我国现阶段私营经济的性质和特点……………（163）
2. 论私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176）
3. 论私营企业主的职能作用及其属性……………（189）
4. 私营企业主的消费行为特征与效应分析……………（197）

（五）社会主义产业结构问题

1. 试论我国生产结构的合理化……………（209）
2. 评“重工业自我循环”说……………（223）
3. 调整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的几个问题……………（235）
4. 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若干理论与对策思考……（253）

（六）社会主义国民收入与再生产问题

1. 国民收入指标利弊浅析……………（269）
2.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分配层次的划分……………（273）
3. 应实行“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结合的原则……………（278）
4. 对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的实证……………（283）
5. 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平衡发展问题……………（292）
6.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问题研究……………（303）

(七) 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

1. 我国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公平的涵义及
衡量标准…………… (315)
2. 个人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论评…………… (329)
3. 论生产资金与消费资金之间的转化…………… (339)
4. 通货膨胀归因论…………… (355)
5. 地方市场保护主义的成因、危害及对策…………… (370)
6. 改革是新旧体制转换的艰难过程…………… (375)

(一)

总 论

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

江泽民总书记在1991年4月27日召开的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巨大的威力，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当前，我们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繁重艰巨的国内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①不久，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②可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已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崇高任务和神圣职责。对此，本文试图就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若干问题，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求教于经济学界同仁。

一、在当今历史条件下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

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决不是一句空泛的政治口号，而是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血与火的斗争实践所得出来的一个科学结论。

“四个坚持”是立国之本，是强国之路。坚持马克思主义，是

① 见江泽民：《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经济日报》1991年6月16日。

② 见《经济日报》1991年7月2日。

“四个坚持”之一，也可以说是“四个坚持”之“帅”，这是因为：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共产党的领导从思想上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那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统帅的。因此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魂”，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立国安民”的“精神支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就等于失去了“国魂”和“精神支柱”，社会主义国家就会改变颜色。这决非是危言耸听，当今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就是有力的证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也决非是老生常谈，在当今世界风云复杂变幻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从国际上讲，是抵御和战胜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迫切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斗争的战略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武力征服为主转为“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渗透”为主，即推行所谓“不战而胜”的战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曾被帝国主义的武力所征服，但却在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和经济文化渗透面前吃了败仗。西方文化理论思潮在国内泛滥，丧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近1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国门大开，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化理论思潮伴随着先进的科学技术一齐涌了进来。尽管西方文化理论思潮中不乏有进步与科学的东西，但不可否认，其中有相当的成份是行使“和平演变”功能的，是帝国主义推行“不战而胜”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在一个很长时间里曾毫无察觉，甚至麻木不仁。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及其以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制裁”，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的政治头脑开始清醒，并认识了这样一个真谛：“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

规律,把握世界形势变化的本质,不为历史长河中的漩涡和逆流所迷惑。”^①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我们把握世界形势变化的本质,战胜各种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施行“和平演变”图谋的客观需要,是确保我国社会主义江山永不改变颜色的重要保证。其次,从国内讲,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有多少仁人志士,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前赴后继,英勇捐躯,但全部都失败了。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才克服重重艰难险阻,闯过一个个急流险滩,战胜各种险风恶浪,从一个胜利走上另一个胜利,终于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建设的社会主义,既要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又要有中国的特色,它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四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凡是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大起大落、左右摇摆,偏离社会主义航向,甚至遭受巨大的挫折与损失。1958年的“大跃进”和10年“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证。相反,凡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与阻力,都能克服和战胜;无论是犯“左”的错误还是犯“右”的错误,也都能较快地予以纠正,从而保证我国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成败与存亡,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处于低潮,各种机会主义泛滥,社会主义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经济日报》1991年7月2日。

体系遭受严重破坏与挫折的情况下，我们更应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要性、尖锐性和迫切性。

二、要充分重视国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国的影响

自马克思主义问世以后，国际上一直存在着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尽管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面目出现，采取的手段和策略有所不同。其核心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宣扬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鼓吹资本主义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后，这股思潮也侵入了我国。它在我国是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面目出现的。他在中国一出现，就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警觉。1981年7月，邓小平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尖锐指出：“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象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①由于种种原因，这股思潮没有受到彻底批判和清算，以至在国内滋长、蔓延，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场大“风波”。在这场“风波”中，这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极其充分的表演。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公开打出《私有制宣言》，宣称公有制的“丧钟”敲响了，主张全面实行“私有化”。他们还大叫，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应当寿终正寝了”，胡说“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廿世纪最大的遗产”，等等，不一而足。这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决不是孤立的，它是与国际上的反

^① 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页。

马克思主义思潮紧密相联，遥相呼应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货币主义权威密尔顿·弗里德曼曾几次来我国讲学和访问，他在一篇题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前景》的报告中讲：“你们需要一个市场经济，你们需要一个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你们需要一个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经济的前途，他讲了三个字：“私有化，私有化，私有化”。他如此“关心”我们中国，其用心已昭然若揭，就是要把我国搞成一个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国家。这已不是“学术交流”，而是充满火药味的阶级斗争。所以，我们再也不能书生气十足，面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而无动于衷了。彻底批判和清算这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是我们每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战斗任务。

不能回避也不能否认，这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影响到我国的思想文化界和理论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文化界和理论界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各种禁区，大胆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和低估的。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近10年来，在国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袭和影响下，国内思想文化界和理论界也产生了一种贬低马克思主义的不良倾向。据笔者观察，其主要表现有：（1）把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哲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文学理论、美学理论等）视为“陈旧”“落后”的“传统理论”，认为开拓进取、改革创新就是“反传统理论”；（2）不是把立足点和主要注意力放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问题上，而是专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片面”和“错误”的东西加以发挥，并宣称“突破”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否定其“谬误”，“正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契

机”^①；（3）下功夫“研究”马克思晚年对社会主义革命如何产生“困惑”和“失望”，散布社会主义革命悲观论、渺茫论，实际上是为“社会主义失败论”提供理论根据；（4）把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是地位平等的“三大学派”，各有所长，又各有其“片面性”，可以“互补”和“综合”，并标榜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5）认为凯恩斯是同马克思一样的“伟大人物”，甚至有的人认为凯恩斯高于马克思，“原因”是马克思“只有微观经济学”，“没有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是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6）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进行“突破”，以显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例如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否定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剥削制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理论纯粹是“空想”，等等。

上述情况虽然表现在少数人身上，但影响颇广，危害极大。因此，我们决不能漠然视之，而必须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通过理论争鸣的方式来澄清是非、辨别真伪。否则，就难以真正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

三、“学派论”的实质是贬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与价值

在上述列举的诸种贬低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中，最有影响也颇具迷惑力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三大经济学流派之一”的观点。因此，很有必要对它认真地加以分析和评论。

首先，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而决不是诸多学派中的一个普通“学派”。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最深刻、最全面、最彻底地反映客观世界本质及其发展

^① 见《经济学周报》1989年3月19日。